

2007 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荣维木 高士华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

(一) 日本侵华研究

200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70 周年, 也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 70 周年, 因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在史料方面, 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继两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28 册后, 又出版了第 29 至 55 册。从史料来源划分, 该史料集有 4 种类型, 一是加害方日本方面的史料; 二是受害方中国方面的史料; 三是第三方欧美国家等方面的史料; 四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 多数是首次在国内披露, 故有较高的研究利用价值。如在中国方面的史料中, 首次编辑了《遇难同胞名录》8 册, 收入万余名遇难者基本资料。所列者虽然只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很少部分, 但由于该史料每篇都注明了出处, 故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受害的具体情况,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该史料编辑的过程中, 一些编辑者率先利用这些史料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成果。如孙宅巍撰写的《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的重要价值》(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4 期), 即利用新史料分析了当时南京各个慈善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埋尸情况, 从中得结论认为, 南京大屠杀后的埋尸记录, 存在着交叉现象。这种研究, 对于人们客观的评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 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资

料。又如,姜良芹、吴润凯撰写的《从市民呈文看南京大屠杀》(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也是在编辑上述史料集之一《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一书时,通过对存于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共800余份市民呈文的研究,探讨了该史料反映出的屠杀期间的人口伤亡、人员失踪、财产损失等情况。另外,作者还通过这些呈文研究了当时南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心理状况。这些研究,更全面和更具体地反映出南京大屠杀对南京造成社会影响。

除利用上述史料的研究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有如下引人注意的成果。马俊亚的《难民申请书中的日军暴行与日据前期的南京社会经济》(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是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汪伪振务委员会的南京难民请求救济申请书共1000多份,考证了南京大屠杀时平民受害状况,证实遇难者多为平民;日军的焚烧直接摧毁了南京的各类产业;屠杀后南京经济普遍凋落,物价飞涨以及遇难者家属心理阴影等情况。朱天乐的《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的发现与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是通过实地考察与查阅文献,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一处原始实态遗址。马振犊、邢烨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考证了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反抗问题,这是一个以往较少被人提及的问题。作者认为:虽然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几周内,南京军队进行了抵抗,但这些抵抗是分散的和无组织的。王岚的《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载上海《学术月刊》第11期),是依据美国外交关系档案,论证认为,不仅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确凿可信,而且在此前后,包括南京周边地区,日军也施行了屠杀暴行,被害平民多达50万人,作者称其为“泛南京大屠杀”。

除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外,也有人研究了日本的侵华战略,其中较有新意的如下。臧运祜的《七七事变前的日本侵华政策及其演

变》(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2 期), 主要依据日本档案史料, 研究了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直到七七事变发生之前,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 即已制定并实施了“对中国本部政策”; 1933 年—1935 年间, 日本的华北政策基本形成; 广田内阁期间, 分离华北的政策全面确立; 七七事变前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 而这一政策是日本军部与政府的一致意志, 也是日本局部侵华的依据; 从这些政策的演变过程来看, 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 经由华北事变, 迅速走向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 并非偶然; 这不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而且也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的一个重要阶段。鹿锡俊的《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载《近代史研究》第 6 期)。该文主要依据日本档案, 考证了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侵华战争扩大化之间的关系。作者结论认为: 日本在战争初期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 但它的实际行动却与这一方针背道而驰, 是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道路。在欧洲局势发生变化后, 日本急于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问题的方向, 进一步结盟德意, 企图通过南进而一举多得, 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与太平洋。作者还认为: “在这一过程中, 日本的文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 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

关于日本侵华的具体史实, 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肖自力的《战时日本对中国钨砂的掠夺与国民政府的应对》(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1 期)、王翔的《日军侵占海南期间推行军票的过程》(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1 期)、郭铁椿的《满铁与九一八事变》(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1 期)、余子侠的《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载《抗日战争研究》第 2 期)等, 均从不同的方面考证了日本侵华的具体史实。

(二) 中国抗日研究

关于中国抗日研究, 2007年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与经济研究。

在战时外交研究方面, 中美关系的研究比较引人注意。其中, 如下文章具有新意。关于战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以往较少有人论及, 而于化民的《短暂的合作: 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 则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战争后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作者利用了大量中美两国资料, 论述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如何开启了中共与美国合作关系、中共对史迪威指挥权的支持、中共配合美军登陆的战略设计、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实质、赫尔利在国共纷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美国军事战略变化对其与中共合作的影响等等。作者研究认为: 战争后期, 美国出于对日反攻作战的需要, 排除了蒋介石的干扰, 谋求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 而中共对此予以了积极的回应, 这主要表现在对史迪威的支持与配合美军登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但是, 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由蒋介石主导的亲美国家, 用以对抗苏联在远东的扩张企图。因此, 尽管罗斯福主张在国共之间采取一种相对灵活的政策, 但赫尔利却坚持了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最后的结果是, 中共与美国的合作并未达到双方预期的目的, 而对抗必然代替合作。同样是研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刘中刚、孟俭红则在《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中, 从一个具体方面考察了中共与美国合作关系的过程与结果。文章详实地描述了中共从1942年开始至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结束的争取美援的全部历史过程, 结论认为: 中共争取美援的失败主要有三个原因, 即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丧失、蒋介石的阻挠。但是通过此举, 中共也有所收获, 即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了敌后抗日的业绩、逐渐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对美外

交经验并吸引了一些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

关于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有如下研究值得注意。张值荣、渠怀重的《抗战前后中美英西藏问题的交涉》(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利用了大量的美英国家档案,通过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前后与美英在西藏问题上的交涉,论证认为:“西藏很早就受到西方的觊觎。与美国相比,老牌殖民帝国英国更早涉入西藏问题,早在20世纪初英国就确立了在西藏势力范围的优势。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发现西藏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时,势必与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发生冲突。”作者还认为,由于战时中国与盟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与香港问题联系起来,英国虽然“并不承认自己有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义务”,但却主张维持西藏的现状;美国的政策则是:“就战争全局而言,中国政府的态度对美国和各盟国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和西藏当局的任何关系中……应该避免无意之中和无缘无故地触怒中国政府。”尽管如此,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战时都与西藏分裂势力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而在战后,美英两国虽然都有插手西藏的企图,但美国却更为积极,它的“以藏制华”,与其全球冷战战略需要有密切关系。

关于战时美国援华战略与实施的研究,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阮家新的《抗战时期驻华美军部署及作战概况——兼谈中国战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地位》(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该文的价值在于比较详实地叙述了战时美军在华部署及其变化,并且客观地评价了美军援华的作用以及美国援华的战略考虑。二是洪小夏的《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作者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过程与组织机构,认为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培训敌后游击干部,并组建中美联合游击队,而非反共。战后1946年该所即已撤消,只不过它的设备与技术被国民党用于内战了,这与该所建立的初衷并无直接

关系。这个研究多少纠正了一些与史实不符的传统观点。

在战时经济研究方面,包括了国统区研究与根据地研究。国统区研究中较有价值的文章有陈雷、戴建兵的《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与以往研究的不同是,该研究侧重的不是战时统制经济的各个具体政策及其实施,而是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作者认为,统制经济对保障军用民需、巩固后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尽管1942年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这主要不是统制经济本身造成的,而是战争条件的变化造成的。关于国统区经济的个案研究,丁贤勇的《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发展:以浙江抗日战争为中心》。该文是以浙江交通建设为分析对象,具体地论证了经济建设与战争的关系。他认为,战争期间浙江铁路几乎全部损毁,公路毁损五分之四,但战争期间,浙江交通建设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并且把交通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因此结论认为:战争既打乱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又起到了促进了新的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根据地研究中较有价值的文章有李建国的《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该文具体地分析了边区通货膨胀的各种原因,与边区抑制通货膨胀的各种办法及其结果。

关于战时国民党党务工作,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王奇生的《“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载《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文章认为,在战时国共合作与竞争的背景下,国民党军队恢复了政工与党务工作,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政治工作只是军队的附庸,而党务工作又成了政治工作的附庸。作者还比较了同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军队党务工作,认为共产党确实做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结论是,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在不同政党的运用下,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一是

金以林的《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载《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文章详实地记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港澳地区开展党务工作的历史过程,内容涉及人事纠纷、组织宣传工作的失误等;同时也提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国民党在香港打击日伪特工与汉奸方面仍然有所成就。

在中国抗日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研究,也有一些较有新意的成果,这里不一一介绍。

(三)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由于2006年底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启动了共同历史研究工作,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7年,相关的研究出现一个热潮。比较引人注意的研究如下。

步平的《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后中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分歧产生的背景、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他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同时,“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而解决历史问题,必须针对历史问题的产生原因,不是进行“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具体的方法应该是相互交流与理解,“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有普世意义的目标”。该文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理论原则。同年,日本《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出版了以反思战争历史为内容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步平为该书作评,写了《检证战争责任读后》(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分析了日本关于战争历史检讨的特征。他提出,日本对于战争的反省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而该书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仅对个人的责任

进行追究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历史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也使人们看到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与矛盾”,“看到日本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同样是分析日本人的战争观,姜克实的《日本人认识历史问题的症结》(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存在着的问题。他认为,除了政治立场之外,“无构造的历史观”、战后反省程度及片面的被害意识等,也是影响日本社会正确认识历史的重要原因。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除历史观研究外,也有实证方面的研究。米卫娜、申海涛的《战后河北省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载《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主要利用河北省档案馆相关档案,对战后河北省遣返日侨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二 日本方面的研究

2007年日本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依然呈现一种“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大部分研究者各自为战,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寻求新的分析方法,深入挖掘史料,努力构筑自己的有特色的研究天地。也有一些或者是共同研究,即多人合作申请共同研究课题,集中攻坚;或者是分担合作撰写同一部著作,形成一种从各自不同角度、方向对同一个问题的多层次、多方法的阐释。

投入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不只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很多日本史的学者也多有建树,他们主要是从日本史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从战争到和平的发展演变,更有不少的在日中国学者,利用自身熟悉中文资料的优势,出版了不少高水平的论著。

这其中,清末、留学生、“满洲国”和中日战争是几个比较受人

注意的领域。

(一) 清末中日关系史研究。

清末的研究已经不是热门, 但还是重点。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开始试图从朝贡关系以外的角度, 来解释清末的中日以及错综复杂的中、日、韩三国关系。

冈本隆司一直对中国的周边特别是围绕朝鲜的中日关系很关注,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了他的《马建忠的近代中国》(马建忠の近代中国), 该书集中研究在中朝交涉中一度很活跃的马建忠, 并把马建忠的一些文章作为资料翻译成日文, 附在书中, 以供研究者参考。

另外, 他还在《现代中国研究》(20 卷)发表了《“洋务”・外交・李鸿章》(「洋务」・外交・李鸿章), 提出李鸿章不仅是洋务派, 其实他也认识到了制度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是一个“变法”论者, 这在日本学者里还是比较新鲜的看法。

日本孙中山研究会编辑、汲古书院出版的《孙中山和南方熊楠》(孙文と南方熊楠——孙文生誕 140 周年記念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 是孙中山诞辰 14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该论文集里对孙中山和南方熊楠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很有新意。

(二) 留学生的研究。

这是个老课题, 但又从新的角度受到了注意, 有研究者开始注意战前的来华日本留学生。

该年的《中国研究月报》, 先是在第 2 期发表了周一川的《关于留学日本中国人的总数》(近代日本に留学した中国人の总数をめぐつて——1922—1926 年度のデータに关する调查), 作者调查、分析了 1922 年到 1926 年的留日学生人数, 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

该杂志然后又于第8、9两期,出版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日本人中国留学史》特集,在第8期发表了川岛真的《日本占领期间华北留日学生的动向》(日本占领期华北における留日学生をめぐる动向),对以前不太注意的中日战争期间的华北留日学生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第9期发表了孙安石的《战前日本外务省的对华留学生派遣》(战前の外务省の中国への留学生派遣について——明治、大正期を中心に)、大里浩秋的《在华本邦补给生》(在华本邦补给生,第一种から第三种まで),对日本来华留学生的派遣进行了专门研究。留日学生特别是清末不但数量巨大、影响深远,研究者也人数可观。日本虽然出于自己的对华外交军事需要,也派遣过留学生来中国,但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这两篇文章可以说开拓了中日之间留学生研究的新天地。

宫城由美子的《关于成城学校和中国人留学生的考察》(成城学校と中国人留学生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刊登于《佛教大学研究生院纪要》35卷,她对成城大学的建立、影响、作用等进行了论述,比较有参考价值。

小岛淑男的《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归国后的活动(一)》(日本大学中国人留学生の归国後の活动<1>),收录在日本大学编纂的《日本大学史纪要》里,该文对日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的活动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两篇文章的共同之处是,根据资料对具体学校进行个案分析,这样的个案分析有助于推动全体留日学生的研究。

(三)“满洲国”和中日战争的研究。

对这个阶段的研究处于热门时期,每年都有不少的论著面世,2007年的中日关系研究中,此势头依然不减。

该研究一般分成两个时间段,即“满洲国”和七七事变后的全

面抗日战争期间。从九一八开始到抗战结束, 虽然中间的七七事变, 标志中日战争的全面开始, 但两个阶段之间, 又有割不断的联系, 很多论著也把这两个阶段接合起来进行研究。

满铁会编辑、吉川弘文馆出版了《满铁四十年史》(满铁四十年史), 该书是近年满铁研究的集大成, 有 624 页之巨, 全书有一半是各种资料集成, 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

山本有造主编的《满洲——记忆和历史》(满洲——记忆と歴史), 由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 该书不但就历史事实进行研究, 也研究曾经在东北生活过的日本人、战后残留日本人的记忆, 然后比较分析这种记忆形成的原因, 比较有特色。

田中隆一的《满洲国和日本的帝国支配》(满洲国と日本の帝国支配), 由有志舍出版, 作者分析了“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中所处的位置, 特别是在“满洲国”的朝鲜人地位, “满洲国”和朝鲜的关系, 日本如何支配殖民地等方面, 有比较独到的看法。

做为《东洋文库论丛》的一种(第 69 种), 东洋文库出版了平野健一郎主编的《日中战争期间中国社会文化变化》(日中战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变容), 该论文集主要是研究“满洲国”的社会文化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 对抗战期间内蒙古和华北的政治文化变化也有所涉及。

加藤阳子的《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战争》(满州事变から日中战争～), 由岩波书店出版, 该书从分析 1930 年代远东的国际关系背景入手, 对于当时东北的政局和列强对东北的争夺、日本国内军队和外务省的种种内争、退出国联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冷静的分析, 有助于人们了解日本发动战争的全貌。

伊香俊哉的《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全面战争》(满州事变から日中全面战争～), 由吉川弘文馆出版, 该书从国际法的角度, 对于日军的残虐行为、战争犯罪有独到的分析。

由御茶水书房出版的光田刚的《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华北政治》(中国国民政府期の华北政治),分析了1928年到1937年的华北政局,该书由2001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黄郛,以及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比较独到的分析。该期间的华北,错综复杂,各派势力参杂其间,以往的研究对此缺少全面的分析,该书弥补了这一缺憾。

吴怀中的《大川周明与近代中国》(大川周明と近代中国),由日本侨报社出版,作者在2004年以《大川周明与近代中国》一文获得名古屋大学博士学位,该书就是在该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作者全面描绘了大川周明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一直以来,日本学界以思想活动为中心,对大川周明展开研究,而对于其与中国的关系缺乏深入系统的全面考察,本书视角独特,观点新颖。

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论争史》(南京事件论争史——日本人は史実をどう认识してきたか)由平凡社出版,该书整理了南京大屠杀争论的来龙去脉,并特别指出,在1990年代前期,根据中日两国的大量资料,研究者关于大屠杀的存在,已经是盖棺论定,但日本此后却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各种否定论调,显然是和日本国内的政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历史学研究》在第9期发表了川裕史的论文《日中战争期间对出征军人家属的优待和地域社会》(日中战争期における中国の出征军人家族援助と地域社会),该文主要探讨了四川抗战期间抗战军人家属的地位问题。四川有256万人参加抗战军队,虽然政府制定了各种优待法规,但实行的效果并不显著,也招致了家属的非难和抗议,这些对基层政权和不为抗战出力的富裕阶层的不满,也为以后共产党在四川的土地改革等革命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对于战后的中日关系,柏书房出版了殷燕军的《日中讲和的研

究》(日中讲和の研究), 作者从外交史的角度, 指出中日讲和是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 从开罗会议一直影响到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作者对战争赔款有精到的研究, 并有专著问世, 此书可以说是作者战争赔款研究的延伸, 厘清了日中讲和对历史和现实的影响。

中央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服部龙二、土田哲夫、后藤春美合编的《战争期间的东亚国际政治》(战间期の東アジア国际政治), 该书是论文合集, 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 1930 年代的东亚国际关系, 中、日、美、英之间的政治角力, 各国内部变动对于外交关系的影响, 其中中日关系是主要分析对象, 有些相关文章值得参考。

川岛真、服部龙二主编的《东亚国际政治史》(東アジア国际政治史), 由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 该书由一些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年轻学者分别撰写, 全面探讨近代以来的东亚国际关系, 其中中国特别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占有很大的分量, 从传统的朝贡秩序, 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都有论述, 代表了近年日本年轻优秀研究者的最新思考。

(作者荣维木,《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
高士华,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